

昭陵文庫寶典

黃雲編



李昊阳主编



三秦出版社

胡元超
编著

昭陵文史宝典

三 秦 出 版 社

《昭陵文史宝典》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张宗平

主任：方文旭

副主任：赵爱国 李昊阳

张志攀

委员：陈学清 高大干 范吉军

杜美丽 刘 群 武超锋

高 娟 胡元超

主编：李昊阳

编 著：胡元超

总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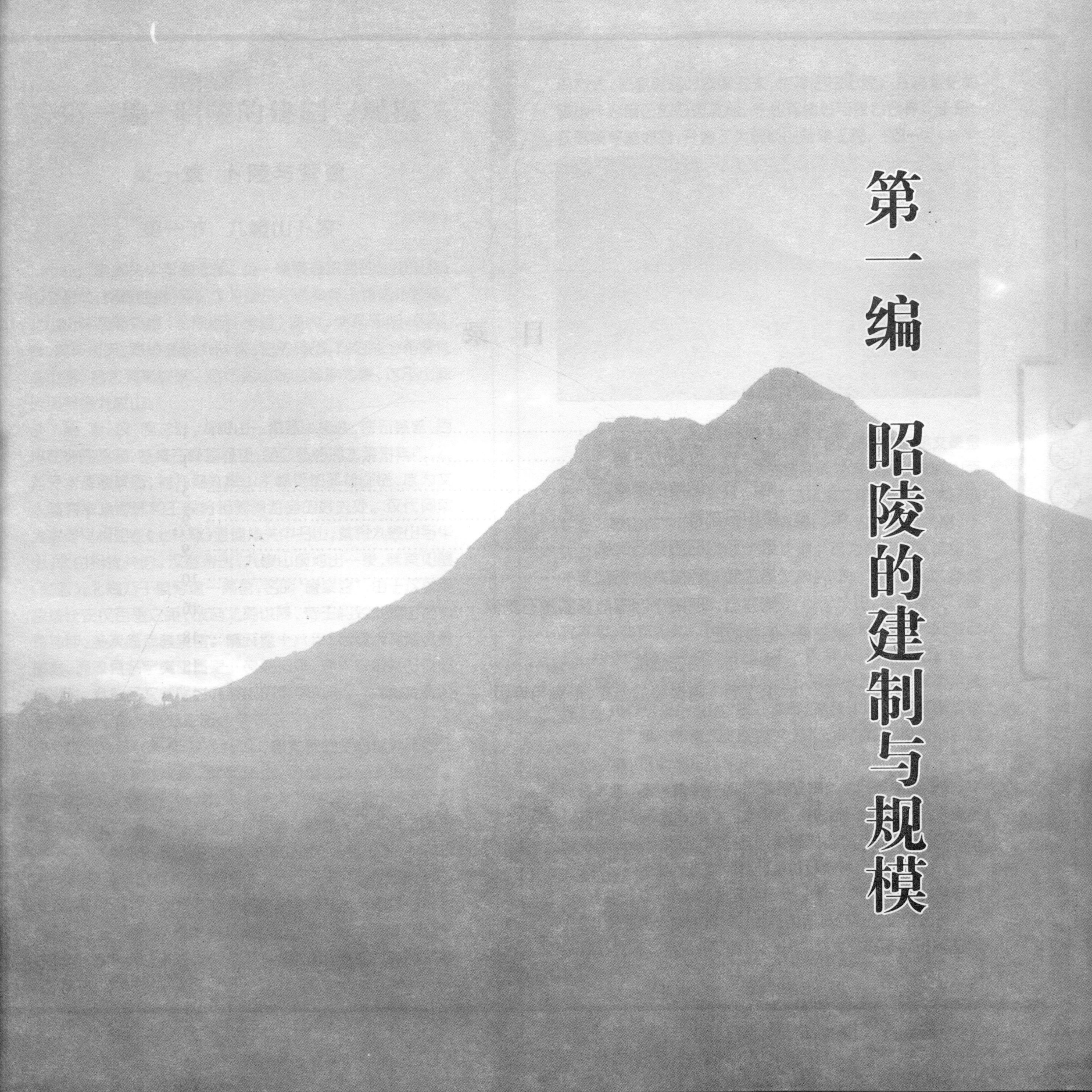
第一编	昭陵的建制与规模	1
第二编	昭陵祭事与保护	29
第三编	昭陵玄宗合葬人物及文史	51
第四编	昭陵陪葬名人	81
第五编	昭陵文物	141
第六编	昭陵文史名碑今译	231
第七编	现代学者论昭陵	283
第八编	新建景区相关文史	381
后 记		403

目 录

第一章 卜陵与营建	1
第一节 九峻山卜陵	1
第二节 昭陵的营建	5
第二章 陵山石刻群	9
第一节 昭陵刻石文碑	9
第二节 昭陵六骏石刻屏	10
第三节 昭陵十四国酋长圆雕石刻像	16
第三章 昭陵陵园	18
第一节 陵园规模	18
第二节 陪葬墓的分布、形制与等级	22

第一编

昭陵的建制与规模



第一编 昭陵的建制与规模

第一章 卜陵与营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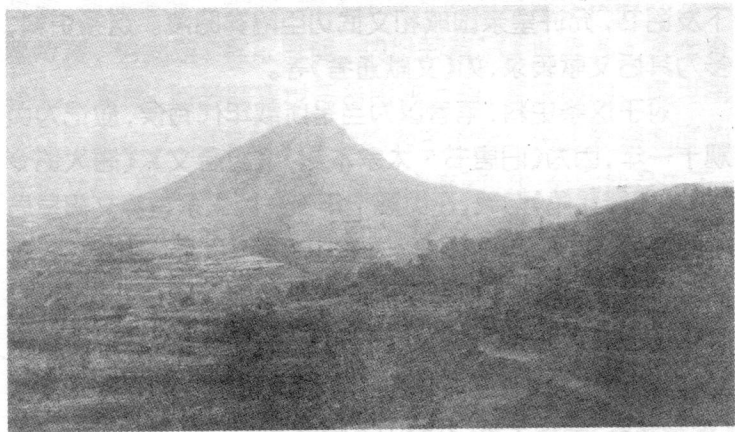
第一节 九峻山卜陵

在广袤的关中平原北部，有一条横亘东西的北山山脉，山峦起伏，蜿蜒曲折，与关中平原南部的秦岭山脉遥相对峙。北山山脉在醴泉县（今陕西礼泉县）境内，突兀而起一座山峰，刺破青天，海拔高达 1188 米，它的周围，均匀地分布着九道山梁，把它高高拱举。古代把小的山梁称为峻，这座山峰因而得名九峻山。

周、秦、汉、唐之时，九峻山一带嘉木掩映，奇石参差，百鸟在林间鸣唱，苍鹰在峰顶翱翔，加之浩浩渭水萦带其前，滔滔泾水逶迤其后，衬托得九峻山主峰更加孤耸回绕，成为文人骚客歌咏寄怀和王侯将相驰骋游猎的好去处。汉代词赋大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里铺排关中名山，就将九峻山与华山、太白相提并论。汉宣帝时，九峻山前地出一泉，味美如醴（甜酒），北周乃于泉旁建一离宫，名叫“醴泉宫”，由于这里距京城长安仅百里之距，故自北周以降，帝王们对九峻山色情有独钟，多次临幸醴泉宫。隋开皇十八年，因境内有周之醴泉宫，而改县名宁夷曰醴泉。唐朝初年，唐太宗带兵打仗和狩猎时，亦曾多次领略过九峻山的奇绝风光。九峻山，实乃是隋唐帝王的一座后花园。

贞观十年（636 年）六月己卯，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因病医治无效，崩于立政殿，享年 36 岁，百官上谥曰文德皇后。《旧唐书·文德皇后传》载，文德皇后在弥留之际，向太宗叮嘱后事说：“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槨，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新唐书·文德皇后传》、《资治通鉴》卷 194 也都有着类似的记载。唐太宗按照皇后的遗言，在九峻山的山腰开凿了一洞石窟，采取“因山而葬”

的方式，把皇后临时安厝进去，定陵名曰昭陵。并决定把昭陵也作为自己的归宿之地，等他驾崩后与皇后合葬。于是，在昭陵穿凿地宫，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工程。（图一）



图一 昭陵陵山远眺

从这些记载来看，似乎首先提出“因山而葬”的是文德皇后，唐太宗只不过是依照皇后的遗言而为其选择了九峻山而已。其实不然，应当说，在文德皇后驾崩之前，唐太宗就已选定把九峻山作为自己与皇后的陵墓，只不过是皇后先崩，于先说出了她与太宗商量的归宿之地。因为在埋葬文德皇后不久，太宗在撰文的《昭陵刻石文碑》中说：“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峻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资治通鉴》卷 194）这里所说的“朕之本志，亦复如此”，其实指的就是“因山而葬”（亦称“因山为陵”）并选择九峻山作为他和皇后的陵墓，这些都是由他决定和选定的。另外，封建帝王的陵寝建制，本来就是一项严肃的国家文物典章制度建设，文德皇后以不干预朝政而名垂青史，是断然不会贸然而为帝王陵寝制度做安排的，她只所以能够说出“但请因山而葬”，毫无疑问，一定是与太宗有过成熟的讨论意见。

《唐会要·陵议》所载的一条史料千余年来多为学者所曲解，以为唐太宗决定把昭陵作为自己的陵墓是贞观十八年的事。这条史料云：“（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昔汉

家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功,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我看九峻山孤耸回绕,因山傍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理。”于是下发诏书,允许皇亲国戚和文武功臣陪葬昭陵。这条史料,多为其后文献转录,如《文献通考》等。

对于这条史料,笔者以为当是所载年代有误,应记为贞观十一年,因为《旧唐书·太宗本纪》、《全唐文》、《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均载,在贞观十年十一月太宗首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后,便于次年初下发《九峻山卜陵诏》,诏书内容与《唐会要·陵议》此条史料后所载的内容相同(《唐会要·陵议》节录了诏书大部分内容)。《旧唐书·太宗本纪》把唐太宗下发《九峻山卜陵诏》的具体日子定为贞观十一年二月丁亥。《资治通鉴》虽未全录《九峻山卜陵诏》的内容,却在贞观十一年二月丁巳条记明了此事,云:“上以汉世豫作山陵,免子孙苍猝劳费,又志在俭葬,恐子孙从俗奢靡;二月,丁巳,自为终制,因山为陵,容棺而已。”从考古角度来看,把《唐会要·陵议》这条史料记为贞观十一年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初唐大臣温彦博,贞观十一年六月薨,“陪葬昭陵”(两《唐书·温彦博传》),在考古方面,已辨明他的墓葬在昭陵主峰以南约五千米的地方村西北,其墓碑已被搬进昭陵博物馆。既然文德皇后首葬昭陵后即有大臣陪陵,这也说明此时太宗已决定把昭陵也作为自己的陵墓。如果把太宗定昭陵为自己陵墓的时间记为贞观十八年的话,温彦博就不能在贞观十一年陪葬昭陵。另外,根据汉晋以来帝王陵寝惯例,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因素,帝王、皇后则同陵(茔)而葬,也就是说,唐太宗在埋藏文德皇后时,就已经从实质上决定了昭陵是自己与皇后的合葬陵。把贞观十八年作为唐太宗决定自己陵寝位置的时间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唐太宗为什么要选择九峻山作为他和皇后的陵墓呢?照唐太宗《昭陵刻石文碑》和《九峻山卜陵诏》的说法,是为了节俭和防盗。其实这两点,只是选择陵址必备条件之外的附加条件,因为选择陵址的必备条件在当时早已为人们普遍所熟知,所以不必说出。这个必备条件就是,九峻山的地理环境完全符合古代陵寝堪舆所谓的风水条件。

唐太宗选择九峻山作为昭陵陵址的必备条件和附加条件,在当时都有着浓郁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

先说唐太宗选择陵址的文化背景,即必备条件形成的文化背景。

中国古代所谓的陵墓堪舆风水之说,在战国时伴着姓氏的不断扩大及五行阴阳之说的流传而逐渐完善,至南北朝,陵墓堪舆家们就有关陵墓风水问题已有百余部作品问世。这些迷信著作体系庞杂,论点不一,但都认为陵墓风水的好坏可以决定后世子孙的祸福,并基本形成了一套评定风水好坏的理论。贞观时,唐太宗通过与太史丞吕才等人的探讨,认为古代那些堪舆风水理论是“葬书败俗”,“安葬吉凶,不可信用”(《旧唐书·吕才传》),从而彻底否定了风水之说。但是,贞观一朝,太宗并没有诏令天下以绝其事,说明在唐太宗的心目中,还是承认风水之说的文化地位。在当时,堪舆家认为帝王陵墓风水最好符合以下条件:

1.需建在地势高险处。因为这样,既可显示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又可防水浸泡陵墓。

2.陵墓背面要有山势,山势之后又须有水环绕。取意背靠大山,稳妥牢靠;山后有水,取之不竭,而此水又可作为陵墓的一道天然屏障。

3.陵墓前面和两侧要有较底的山势,为陵墓起烘托作用,再前面应是一马平川,显得豁亮开阔,寓意天下太平。

4.陵墓最前面亦应有水经过,算是陵墓的前边界,与陵后之水遥相呼应。

当然,不可能每一处风水宝地都具备所有这些条件,但这些条件满足得越多越好。以上述条件衡量九峻山的形势,会惊奇地发现,九峻山满足了所有条件。它地处渭北高原,山底海拔570米左右,其后群山拱卫,山后便是咆哮的泾水;其前与左右众山罗列,再往前便是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而浩浩荡荡的渭水又东西横穿关中原,并从古长安城中穿过,形成了“渭水贯都”(《全唐文·文德皇后哀册文》)的奇妙景观。所以,自唐以降,封建堪舆家普遍认为昭陵的风水为中国历代帝陵之最佳者。

考虑到中国古代陵墓堪舆文化的深远影响,人们普遍认

为,当年唐太宗之所以选择九峻山作为陵墓,陵墓风水之说一定对他的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

那么为什么唐以前在关中定都的历代王朝,没有选择九峻山作为帝王的陵墓?这是因为:

1. 中国古代陵墓风水理论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如秦汉南北朝时对风水的讲究和隋唐时并不完全相同。

2. 唐以前历代定都关中的帝王没有因山为陵的习惯,他们只把目光放在关中平原靠近帝都的地方,在这里寻找风水宝地。

反过来,我们又可以解释唐太宗为什么会选择九峻山作为陵墓的原因:

1. 九峻山完全符合当时陵墓风水理论所讲究的所有条件。

2. 长安和咸阳附近风水较好的地方已成为秦汉皇家陵园,再在此处建造陵寝不易突出唐陵。

3. 唐太宗认为自己的文治武功远远高于历代帝王,需要建造一座气势更大且不宜烦费民力的陵墓,因山为陵能满足他这个愿望。

4. 古人认为尧帝的陵墓属因山为陵,唐太宗认为自己堪比尧舜,仿照尧帝,标榜自己,也是他“因山为陵”的一个原因。

再说唐太宗选择陵址的政治背景,即附加条件形成的政治背景。

武德时期,唐王朝上下都把主要精力放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加之当时高祖李渊还很健康,所以没有全盘考虑唐代帝王陵寝制度。贞观初年,唐太宗励精政道,同样没有全盘考虑唐代帝王陵寝制度,这在贞观初期薨亡的大臣墓葬位置安排上完全可以看得出。这一时期薨亡的大臣,要么埋葬在死者的故乡,要么埋葬在长安附近,例如李纲、杜如晦等,就被埋葬在长安附近的少陵原上。直到贞观九年,太上皇唐高祖李渊病危,唐高祖、唐太宗父子才把唐代帝王陵寝制度的建立提上了议事日程。《旧唐书·高祖本记》载:“(武德)九年五月庚子,高祖大渐,下诏:‘既殡之后,皇帝(指太宗)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当天高祖崩于太安宫之垂拱前殿。因为高

祖遗诏中有“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之意,所以,太宗没有经过与众大臣慎重研究,便下诏制定高祖山陵制度,要求按照汉高祖刘邦长陵规模,为其父皇营建陵寝,即所谓“令以汉长陵故事,务在崇厚”。但是,唐太宗要为高祖修建汉长陵那么一座陵寝,势必是“程限既促,功役劳敝”(《旧唐书·虞世南传》)。为此,秘书监虞世南曾两次上疏,要求俭约。虞世南的这两篇疏文,可谓奠定以俭约为主的唐代帝王陵寝制度的光辉文献,这里以《旧唐书·虞世南传》为准,分别抄录如下:

臣闻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显,珍宝具物,以厚其亲。然审而言之,高坟厚垆,珍物毕备,此适所以为亲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远虑,安于菲薄,以为长久万代之计,割其常情以定耳。昔汉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费甚多。谏议大夫刘向上书,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槨,用紵絮割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释之所言,为无穷之计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汉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贡赋,以一分入山陵。武帝历年长久,比葬,陵中不复容物,霍光暗于大礼,奢侈过度。其后至更始之败,赤眉贼入长安,破茂陵取物,犹不能尽。无故聚敛百姓,为盗之用,甚无谓也。魏文帝于首阳东为寿陵,作终制,其略曰:“昔尧葬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树,无立寝殿园邑,为棺槨足以藏骨,为衣食足以朽肉。吾营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无有不发之墓,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乃不重痛哉!若违诏妄有变改,吾为戮尸于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将不福汝。以为永制,藏之宗庙。”魏文帝此制,可谓达于事矣。

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汉之君,臣则缄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见圣德高远,尧舜犹所不逮,而俯与秦、

汉之君同为奢泰，舍尧、舜、殷、周之节俭，此臣所以尤戚也。今为丘垅如此，其内虽不藏珍宝，亦无益也。万代之后，但见高坟大墓，岂谓无金玉耶？臣之愚计，以为汉文帝霸陵，既因山势，虽不起坟，自然高显。今之所卜，地势既平，不可不起，宜以《白虎通》所陈周制，为三仞之坟，其方中制度，事事减少。事竟之日，刻石于陵侧，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须，皆以瓦木，合于礼文，一不得用金银铜铁。使万代子孙，并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庙，岂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为坟垅，又以长陵为法，恐非所宜。伏愿深览古今，为长久之虑，臣之赤心，唯愿万岁之后，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扬于无穷耳。

虞世南这篇疏文是以上封事的形式报给太宗的，但太宗没有明确答复，于是，虞世南又上了一篇正式疏文：

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墓，近者十余岁，远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数月之间而造数十年之事，其于人力，亦已劳矣。又汉家大郡五十万户，即目人众，未及往时，而功役与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在虞世南的带动下，很多公卿上奏太宗，请遵高祖遗诏，务从俭约。太宗的心理很矛盾，对中书侍郎岑文本说，他本来也想一如遗诏，俭约操办丧事，但作为儿子，又不忍心让陵寝过于俭素。但是，如果真的按照长陵规模建成了高祖陵寝，他又怕“百世之后，不免有废毁之忧，因而朕为此不能自决”（《唐会要·陵议》）。此后，太宗乃令岑文本、房玄龄等人探讨，讨论的结果是：“高祖长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汉文、魏文并不封不树，因山为陵。窃以长陵制度过为宏侈，二丈立规，又伤矫俗。光武中兴明主，多依典故，遵为成式，实为攸宜。”（《唐会要·陵议》）对这一讨论结果，太宗表示接受，于是下发诏书说：“朕既为子，卿等为臣，爱敬罔极，义犹一体。无容固陈节俭，陷朕于不义也。今便敬来议。”（《唐会要·陵议》）于是，高祖献陵制度，颇有减省。

在唐王朝为高祖营建献陵的规模问题上，虽然太宗最后依照了虞世南等人从俭的主张，但完全可以感觉到，太宗对

这样的结果不是很满意的，节俭是太宗所希望的，但坟垅的高大也是太宗所希望的。但在堆土成陵的情况下，这二者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毫无疑问，通过这次陵寝制度的辩论，虞世南所说的“因山为陵”既能节俭民力又能使陵寝显得高大并有利于防盗，为太宗最终选择九峻山作为他和皇后的陵墓起到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启迪作用。

另外，今人以为，唐太宗之所以能选择九峻山作为其陵墓恐怕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 中国自出现奴隶制国家后，就把全国分为九州，九州拱卫天子，天下大同。而九峻山的九条峻梁拱卫主峰，唐太宗选择九峻山，大概也取九州拱卫之意。
2. 九峻山从东北望去，如虎雄踞，首尾酷似。帝王乃龙虎之相，太宗恐怕也是取其形状类虎，有威镇天下之意。

综上所述，九峻山完全满足了唐太宗对自己陵寝在文化上（风水之说）和政治上（既节俭又雄伟且能防盗）的要求。所以，从古到今，人们普遍对昭陵形胜大加褒扬，毕沅《关中胜迹图志》中引用林侗《昭陵石迹考》（略）云：“九峻山……地脉从崆峒来，渭绕其前，泾环其后而出其东，岐、梁西峙，仲山、嵯峨东障，南则终南、太乙，天外列屏。”

关于昭陵的陵名，史书上没有专门的解释。古代谥法解释“昭”字说：“圣文周达曰昭，明德有功曰昭”（《唐会要·谥法上》），古代谥法也有谥顺、贞、献等美好字眼的。根据唐代帝王陵墓如献陵、贞陵、乾陵、泰陵等选取吉利、祥顺、平和、美好字眼的做法来看，昭陵的定名，显然也是选择了一个歌功颂德的美好字眼。

“因山为陵”这种营陵形式，古已有之，如汉文帝的霸陵、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曲阜九龙山鲁王墓都是“依山为陵，不复起坟”。但是，这在当时都未被定为制度，唐太宗因山为陵并要求子孙“奉以为法”，却开创了唐代帝王因山为陵的先例。

唐代共有21位皇帝，其中昭宗李晔和哀帝李祝，因唐末战乱，分别葬在了山东菏泽（和陵）和河南洛阳（以王礼葬，不称陵），其它19位皇帝都埋葬在关中平原北部，因女皇武则天（葬时去帝号，称则天皇后）和高宗李治合葬乾陵，因而在关中建陵18座。关中18座帝陵当中，高祖李渊的献陵早于昭陵，不

曾因山为陵，昭陵以后的16座帝陵当中，竟有13座因山为陵，只有3座堆土成陵。兹将关中唐十八陵情况列表于次：

庙号及姓名	陵名	位置	形制
高祖李渊	献陵	三原县北20千米荆原	堆土
太宗李世民	昭陵	礼泉县东北22.5千米九峻山	因山
高宗李治	乾陵	乾县北2.5千米梁山	因山
中宗李显	定陵	富平县北10千米凤凰山	因山
睿宗李旦	桥陵	蒲城县北15千米丰山	因山
玄宗李隆基	泰陵	蒲城县东北17.5千米金粟山	因山
肃宗李亨	建陵	礼泉县北12.5千米王床山	因山
代宗李豫	元陵	富平县西北15千米檀山	因山
德宗李适	崇陵	泾阳县西北20千米嵯峨山	因山
顺宗李诵	丰陵	富平县东北17.5千米金瓮山	因山
宪宗李纯	景陵	蒲城县东北15千米金灿灿山	因山
穆宗李恒	光陵	蒲城县北10千米尧山	因山
敬宗李湛	庄陵	三原县北柴窑原上	堆土
文宗李昂	章陵	富平县西北10千米乳山	因山
武宗李瀍	端陵	三原县北徐木原	堆土
宣宗李忱	贞陵	泾阳县西北30千米仲山	因山
懿宗李漼	简陵	富平县西北30千米莽金山	因山
僖宗李儇	靖陵	乾县东北10千米鸡子堆	堆土

第二节 昭陵的营建

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太宗即命将作大匠阎立德“摄司空营昭陵”（《旧唐书·阎立德传》），所以，从技术角度讲，阎立德是昭陵建制的总设计师。阎氏在营建昭陵初期，曾因“怠慢而解职”（《旧唐书·阎立德传》）。何谓怠慢？今学者

普遍认为是唐太宗嫌阎氏设计的规模不够宏大，难以表现帝王气象。贞观十三年，太宗又把阎氏从博州刺史位置上“复为将作大匠”，依旧负责昭陵的营建工程。阎氏此次督建昭陵，一直到贞观二十三年埋葬唐太宗后。

阎立德，雍州万年（今西安市）人，父亲是隋朝著名美术大师、建筑设计大师阎毗。阎立德早传家业，诸艺俱精，历官将作少匠、将作大匠、工部尚书等职，先后设计并组织了献陵、昭陵、翠微宫、玉华宫的营建，还主持了朝廷袞冕大裘等六服及帝王仪仗腰舆平扇的设计，是唐代最杰出的建筑、服装、舟桥设计大师。他所设计的献、昭二陵建制格局，为唐代帝王陵墓格局奠定了基础，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阎立德奉旨设计的昭陵建制，总的来讲，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陵山主体建制，二是陪葬墓群建制，由此二者形成了完整的昭陵陵园建制。陪葬墓群建制的具体情形，后面将专章介绍，这里介绍昭陵陵山主体建制。

昭陵陵山主体建制，大致由六大部分组成：

- 1.墓道和地宫（仅见于文献）。
- 2.陵山栈道。
- 3.朱雀门、献殿建筑群。
- 4.寝宫建筑群。
- 5.北司马院（亦称北阙、玄武门等）建筑群。
- 6.东青龙门、西白虎门及垣墙角阙建筑群（仅见于文献）。

在正式穿凿昭陵地宫之前，先临时安厝文德皇后于九峻山。现在勘查，昭陵陵山的南侧、东南侧半山腰，有3处石拱券窑址和9处凿山为窟的石室。3处石拱券窑址有1处保存较好，用石条构筑成拱券窑洞4孔，上下两层，窑洞内出土大量陶人俑、骑马俑、马、牛、犬模型明器、陶罐、陶鼎等残片，很可能是放置陪葬品的外置便房。9处石室分为两种形制，1号为一种，其余2—9号为一种。1号石室位于陵山东南悬崖上，洞口朝南，前有栈道遗迹。洞内结构与唐代墓葬内部结构近似，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通长12.5米，其中墓道长4.5米，宽3.2米，墓室东西5.1米，南北5.8米，底与穹隆顶高约4米；墓室内壁还残存有壁画，可辨为一座建筑的屋顶部分。2—9号石室均较小，总长不超过8米，无墓道、壁画

等。2—9号石室的性质很难确定,但一般认为,1号石室即是当年临时安厝文德皇后的墓室。开凿这个石室的工程量,与唐太宗《昭陵刻石文碑》所谓的“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是基本相符的。

昭陵还没有发掘,其墓道地宫的情况现在很难全面掌握,史料对它的记载惟新旧《五代史·温韬传》及《唐会要·陵议》较详。据这些史料记载,昭陵依山凿石为元宫(亦称玄宫,即墓室),从墓道至墓室深约七十五丈,前后安置了五道石门。“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相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繇)、王(羲之)笔迹,纸墨如新”(《新五代史·温韬传》)。因墓道口周围山势陡峭,故而缘山凿石架有栈道,栈道绕山腰四百米,盘曲而上,直达墓道口。另外,在接近山顶部的地方,又凿石扩地,修建了房舍、游殿,供墓主人灵魂游乐,用栈道与墓道口连接,使守陵的宫女能够“供养如平常”(《唐会要·陵议》)。唐高宗时,为了防盗,阎立德奏道:“元宫栈道,本留拟有今日。今既始终永毕,与前事不同。谨按故事:惟有寝宫安供养奉之法,而无陵上侍卫之仪。望除栈道,固同山岳。”但高宗“呜咽不许”(《唐会要·陵议》)。长孙无忌等大臣又援引《礼经》等有关侍奉亡灵之制,重新上表请除栈道,高宗依奏,才将栈道拆除,从此,“陵寝高悬,始于外界隔绝”(《唐会要·陵议》)。安史之乱时,杜甫两次经过昭陵,在《重经昭陵》诗中描述昭陵绝境道:“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九峻山属石灰岩石质,易被风雨剥蚀,加之经过历代兵燹破坏,陵山上的建筑今已毁坏无遗,但游殿和栈道遗迹仍清晰可辨。

从现代对唐帝陵考古所取得的数据来看,史料对昭陵墓道地宫深度(75丈,230米)的记载应是可信的。唐关中十八陵中,泰陵、丰陵、景陵的墓道曾被掘出,“经观察,先是在基岩上垂直下凿,作成纵剖面呈‘L’形—墓道,在最里的崖壁上设墓门。墓道宽度,泰陵5.5、丰陵2.5、景陵4.4米;墓道的长度,以露出来的部分来计测,泰陵20、丰陵25、景陵28米。曾经发掘过的乾陵墓道总长65米(未完全发掘)、宽3.87米;桥陵70米、宽3.78米”(日人村多加史《唐陵选地考》)。陪

葬昭陵的太宗贵妃韦氏墓,与昭陵一样,因山为陵(墓),1990年,该墓被昭陵博物馆考古工作队发掘,测量其墓道50.1米。

《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并阴》(游师雄刻)中,线刻了一幅《唐太宗昭陵图》。图中绘制陵山有垣墙围绕,墙四隅建有角楼,正中各开一门,南曰“朱雀门”,北曰“玄武门”,东曰“青龙门”,西曰“白虎门”。在陵山垣墙西南,建有寝宫。现代考古已经证明,朱雀门遗址在陵山正南约800米处,门外有双阙台址,门内有献殿遗址。玄武门在陵山正北约600米处,门外有双阙台址,门内是北司马院。寝宫遗址在陵山西南约600米处。但东西两门门址、围墙及角阙遗址至今尚未发现。张建林在《唐昭陵考古的重要收获及几点认识》(《乾陵文化研究》)一文中,认为“游师雄《唐太宗昭陵图》中有关陵园布局的部分蠹测成分居多”,且游师雄所谓的“内城四角各有角阙,……被近年调查结果所否认”。张氏所论,或为确切。

献殿位于朱雀门内,背依陵山,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根据唐陵建制模式,献殿的中轴线亦即墓道的中轴线,据此,可以测出昭陵墓道的基本方位。现存献殿遗址范围约四十米见方。殿南有门,殿内砖铺地面,残墙断垣上留有壁画遗迹。上个世纪80年代,昭陵博物馆考古工作队在献殿遗址上采集到一件当年安放在屋脊上的陶鸱尾,高达150厘米,底长100厘米,宽65厘米,重约150公斤。以此件尺寸来推算,献殿当高10米左右,应该是重檐九间。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献殿是多么高大雄伟。(图二)

朱雀门外阙台遗址,现存东西二阙址,间距约90米,均为夯筑,现呈圆丘形。双阙台遗址内侧,有推测为列戟廊的廊址一对。其与献殿之间的朱雀门址,还未发现。

寝宫遗址呈长方形,东西约237米,南北约334米。四周尚存墙垣残迹,墙基宽3.5米。南北墙垣中央各辟一门,遥遥相对。墙垣内是一片平坦的夯土层,厚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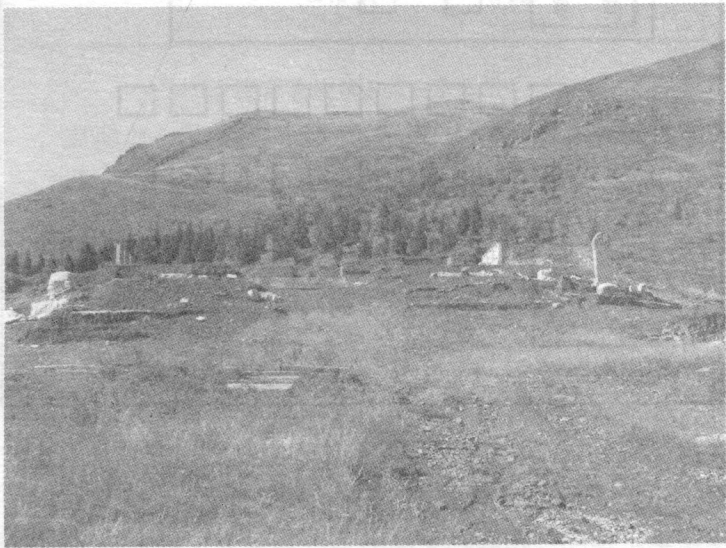


图二 昭陵献殿出土陶鸱尾

米。寝宫是供唐太宗灵魂起居的场所，其侧后有许多附属建筑，是守陵官员和日常侍奉人员居住的地方。寝宫里边供奉着唐太宗与文德皇后的遗像（拟或塑像）和生前衣物，供前来祭祀的后辈帝王瞻仰膜拜。唐贞元年间，昭陵寝宫建筑群被野火焚毁，后建的寝宫移至昭陵西南9千米处的瑶台寺附近，故称其为“下宫”。据《唐会要·陵议》，贞元十四年（798年），德宗曾就昭陵寝宫下移问题诏令臣下进行过充分讨论，吏部员外郎杨于陵力主下移，认为“陵园寝宫，非三代之制，自秦汉以来有之，但相沿于陵旁置寝，未闻去陵有远近步数之节”。正因为如此，唐陵的寝宫距主陵没有固定的距离，形成了“择其高爽，多取清严，去陵远近，本无定制”（《唐会要·陵议》）的寝宫位置选定方式。尽管如此，唐陵寝宫位置还是多仿效献、昭二陵，建在主陵的右下方。

北司马院遗址，位于陵山北玄武门内。2002年8月至2003年11月，该遗址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昭陵博物馆依法联合发掘，出土各类文物二千余件组。虽然该遗址的发掘报告尚未发表，但考古领队张建林先生在《唐昭陵考古的重要收获及几点认识》一文中，仍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信息，今以张文而铺陈如下：

北司马门是一组完整的南北向轴对称建筑群，南北纵长86米，东西最宽处61米，分布于九峻山北侧山梁的三个小台



图三 昭陵北司马院遗址

阶地上，整个遗址所处的地势呈南高北低的状态，东西两侧是沟壑。建筑遗迹由北向南逐渐升高，依次为第一台阶地上的三出阙台基一对，推测为列戟廊的廊址一对，北围墙外的小型建筑4座；第二台阶地的北边缘是庑殿式门址和北围墙、砖砌排水沟等；第二台阶地以上，仅残存西侧建筑遗迹，从南向北依次为偏殿、方形小建筑、阶梯状长廊等。建筑群外环绕带砖铺散水的夯土墙，也只有西侧保留有部分墙基。（图三）

东西双阙位于唐代建筑群的最北端，两阙间距31.5米，仅存阙台下部，形制相同，内为夯土台基，外围包砌砖壁。以东阙为例，东西长14米（不包括散水），夯土残留最高处达4米。东窄西宽，东部最窄处7.2米，西部最宽处7.67米。南北两壁自东向西各有两次扩出，每出宽约18—22厘米。夯土外围最底部以石条奠基，石条基础上以砌砖垫平，然后再次码放石条形成台面。石条台面上下砌砖均有收分，但砌法不同。石台以上的砌砖为层层叠涩内收。石台以下砌砖皆经二次加工，露明面磨光，其他各面削砍，内薄外厚，砌成严丝合缝的内收斜面。包砖层厚60—85厘米。阙底部周绕宽85厘米的砖砌散水，与阙体相应成三出状。朱雀门双阙规模应与北司马门双阙规模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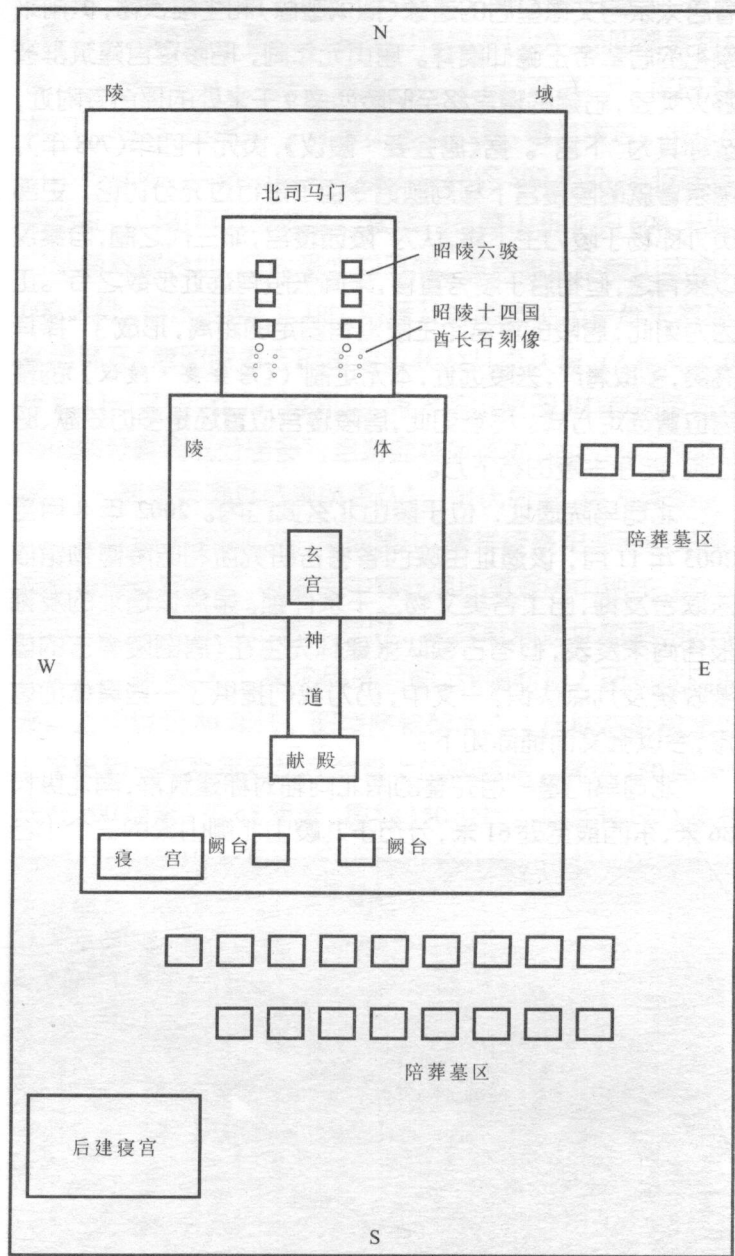
庑殿式门址东西25.8米，南北12.6米，残存夯土台基、夯土墙、砖铺散水、柱础石、门砧石等遗迹。从现存遗迹分析，庑殿式大门建造在夯土台基上，台基周围以砖包砌，台基下是一周砖铺散水。根据残存石柱础的间距，可知作为大门的庑殿进深两间、面阔五间，中间三间设门，东西两间分别有东西向隔墙将之分为南北间。庑殿东西两端有山墙，与夯土围墙相连接。这种庑殿式的唐代门址迄今只发现两处，另一处是唐长安城大明宫玄武门的内重门，结构基本一样，但规模要小一些，进深二间、面阔三间，正中一间设门。

在三出阙的南侧各有一座长方形的建筑台基，介于阙和门之间，南北10米，东西5.7米，夯土台基就地势而建，外围包砌砖，台面仅残留有一个柱础石，四面无墙，推测可能是门外放置列戟的廊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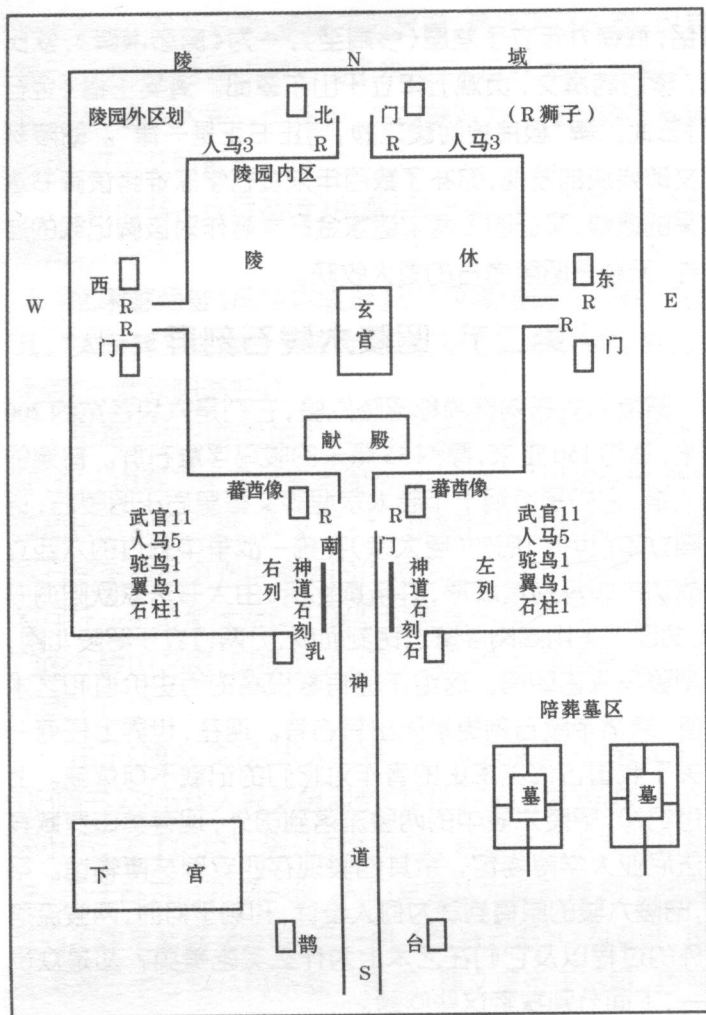
原放置“昭陵六骏石屏”和“十四国酋长石刻像”石刻的长廊基址位于建筑群的西南角,总体呈阶梯状,由北向南渐次升高,进深一间(后扩出檐,成两间)、面阔七间,南北通长29米,东西10.2米,残存有10个柱础石和4个置于原位置的石人像座,北端一间保存有六骏之一的基座,据保留原位的石人像座和六骏浮雕基座分析,北部3间原放置“六骏”中的3件,南部4间放置“十四国酋长石刻像”中的7件。东侧亦应有一座相对应的长廊建筑,早年被破坏已尽。

从唐代中期开始,历代帝王祭祀昭陵,因为去献殿的台阶路崎岖难行,便改在北司马院进行,久而久之,便在北司马院留下了数十通祭陵碑,人们也习惯把这里称作祭坛,清代时,又在这里建成了祭祀建筑群。清代的祭祀建筑群基本叠压在唐代建筑遗址之上,有些建筑破坏了唐代建筑遗址。建筑群外圈由长方形的砖砌围墙环绕,南北纵长95米,东西宽54米,北面超出唐代遗址范围,东西有所收缩。东西两面的清代砖砌墙跨过唐代的東西两阙址,形成打破关系。围墙内建筑以北端山门到南端大殿间的通道为中轴,东西对称。遗迹自北部第3到南部第5台阶地,每个台地有一组建筑,各组间距较大。建筑遗迹从北向南依次为山门、砖铺道路、偏殿、过厅、大殿和清代放置“六骏”的庀房等。清代建筑遗迹中发现有多处利用原废弃的唐代建筑材料的现象,如砖砌围墙的中间以唐代砖作为填充,山门石台阶杂以唐代六骏石基座残块,偏殿、大殿基础以唐代砖垫底等。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唐代帝王“因山为陵”型陵山主体建制,以昭陵为发轫,以乾陵为定制。对照二陵陵山主体建制,会发现,昭陵的奠基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南作用。(图四、图五)



图四 昭陵基本结构示意图



图五 乾陵基本结构示意图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发《九峻山卜陵诏》，强调“犹恐身后之日，子子孙孙，尚习流俗，犹循常礼，加四重之椁，伐百祀之木，劳扰百姓，崇厚园陵”，故而“预为此制，务从俭约”。接着，他又针对王公大臣及百姓间的厚葬恶习，再次下诏纠正，严令“其王公已下，爰及黎庶，自今已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在京五品已上及勋戚家，仍录奏闻”（《贞观政要·俭约》）。九峻山石质松软，石层破碎，虽然凿有75丈深的元宫，但较之秦汉堆土而成的巨大坟垅，要省工省时得多，基本上达到了太宗俭约的目的，然而同时也达到了太宗欲为雄伟高大的目的。昭陵从平原到

陵顶的垂直高度达 650 米,无疑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帝王陵墓,同时,昭陵也是世界上唯一架有栈道的帝王陵墓,在我国乃至世界帝陵建制上有着独特而崇高的地位。

当年的昭陵广植松柏，因而有柏城之称。晚唐诗人刘沧描写昭陵秋色道：“原分山势入宫塞，地匝松阴出晚寒。”在绿树与青山的掩映之中，陵山周围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的殿堂栉次鳞比，比屋连甍，亦是非常壮观。

第二章 陵山石刻群

昭陵自贞观十年十一月葬文德皇后始,至贞观二十三年八月葬太宗止,在北司马院内外列置了三件(组)石刻作品,分别是昭陵刻石文碑、昭陵六骏石刻屏、十四国酋长圆雕石刻像。本章介绍这些石刻作品的具体内容及存佚情况。

第一节 昭陵刻石文碑

昭陵刻石文碑，亦名文德皇后碑，贞观十年立，唐太宗撰文，欧阳询隶书。该碑早年已佚，近年发现残块，故尺寸不详。

记述该碑的文献，最早的是《太宗实录》，该书著录了太宗撰写的原文，但因不是金石著作，故未对碑石情况作说明。《资治通鉴》在贞观十年十一月条叙及此事，云：“冬，十一月，庚午，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帝复为文刻之石，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嵎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

宋代金石学兴起后,至民国年间,先后对昭陵刻石文碑著录的著作有《金石录》、《京兆金石录》、《宝刻类编》、《宝刻丛编》、《醴泉县志》、《陕西金石志》、《续修陕西通志稿》等,皆云太宗御撰,欧阳询奉敕隶书。宋游师雄《昭陵图碑》载此碑竖于昭陵北司马院外右侧。但该碑早年已佚,明以后金石著作如《醴泉县志》、《陕西金石志》等,均据两宋时金石著作罗列,著者并未亲见碑石,故《金石萃编》、《昭陵碑考》、《昭

陵碑录》等著作不曾收录该碑文字,最新出版的《昭陵碑石》也把该碑列入昭陵已佚石刻名单。

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昭陵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工作队,对昭陵北司马院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发现的数十通昭陵祭陵碑中,认定两通是明代截断昭陵刻石文碑而镌。

其一:碑高122厘米,厚39.5厘米,宽67厘米,弧形碑额。碑面文字泐灭已尽,弧形碑额篆题“御制祝文”四字,题额方式及字体与发现的数通有年号的明代祭陵碑相同,故可定此碑为明代祭陵碑。在该碑榫部碑面存有隶书“率更令臣欧阳询奉”等8字。这些字皆右倒90度,若将该碑左倒横放,则这些字为正向竖排。这说明,这些文字非该碑镌者所刻,而是该碑所取之石上的原字。考古工作者认为,该碑原石即昭陵刻石文碑。隶书“率更令臣欧阳询奉”内容亦与文献记载吻合,欧阳询曾任太子率更令,其书法世称“率更体”。该碑厚39.5厘米,亦是昭陵刻石文碑的厚度,该碑高122厘米,弧形顶部和榫部明显有斜刹,说明打磨并不严重,据此,可知昭陵刻石文碑的宽度亦是122厘米。

其二:碑高138厘米,厚39.5厘米,宽55.5厘米,弧行碑额,碑面文字磨灭严重,不可辨认,惟落款处隐约可辨“正统元年”四字。“正统”是明英宗朱祁镇年号,凡14年,即1436年至1449年。该碑厚度及石质与有欧阳询隶书的明祭陵碑同,考古工作者认为,此碑原石亦是昭陵刻石文碑。

另外,昭陵北司马院外右侧现存一断裂龟趺,长154厘米,残宽76厘米,高74厘米,柳口宽39厘米。考古工作者认为,该龟趺乃昭陵刻石文碑之趺,因为认定的昭陵刻石文碑厚39.5厘米,附合碑厚比柳口宽度稍大的唐代制碑习惯。这也印证了游师雄《昭陵图碑》对昭陵刻石文碑的记载。

清叶昌炽《语石》云:“有唐一代书学,如日中天。”又言在真书领域,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各擅胜场,难可轩轻”,惟在分隶领域,欧阳询独领风骚,云:“唐承汉魏之后,分书宏伟,犹有古法。国初欧、虞、褚、薛诸家,惟信本(欧阳询表字)兼工此体。”昭陵刻石文碑残块发现以前,欧氏隶书作品仅存两件,一为《宗圣观记》,欧氏撰序并书,陈叔达

撰铭,武德九年立于盩厔(今周至),一为《房彦谦碑》,欧氏书,李百药撰文,贞观五年立于山东章邱。清吴玉搢《金石存》云此二碑“极挑拔险峻之妙,与正书正是一律”。昭陵刻石文碑残块的发现,弥补了数百年来金石学家难睹该碑书法风采的遗憾,又证明了两宋诸家金石学著作对该碑记载的准确性,无疑是昭陵考古的重大收获。

第二节 昭陵六骏石刻屏

昭陵六骏石刻屏简称昭陵六骏,它们是六块各宽约200厘米,高约150厘米,厚约35厘米的骏马浮雕石屏。普遍的说法是,它们是贞观十年唐太宗埋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后,诏令阎立本(世传)把他(唐太宗)在统一战争中骑过的六匹立有战功的骏马描绘成形,并亲撰铭赞,由大书法家欧阳询书丹,命匠工采用高肉浮雕法镌刻而成,分两行立于昭陵北阙,石刻骏马头皆朝南。这组作品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唐诸帝陵石刻更是无出其右者。现在,世界上任何一本关于我国古代美术史的著作对它们的记载不可或缺。上个世纪初,昭陵六骏中的两骏流落到国外,现存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余其四骏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可是,昭陵六骏的原稿到底为何人设计,刊刻于何时,两骏流落国外的过程以及它们在艺术上为什么美轮美奂?却是众说不一,下面分别探索这些问题。

一、昭陵六骏刊刻时间与原稿作者

关于昭陵六骏刊刻时间,在古代即有二说:一说为贞观十年埋葬文德皇后不久,即太宗时刊刻说;另一说为贞观二十三年太宗驾崩,高宗即位之初,即高宗时刊刻说。

持太宗时刊刻说的史料,较早的大概有以下几种:

《太宗实录》云,贞观十年文德皇后病逝,太宗命营建昭陵,诏曰:“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

《旧唐书·丘行恭传》:“初,从讨王世充,会战于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虚实强弱,乃与数十骑冲之,直出其后,众皆披靡,莫敢当其锋,所杀甚众。既而陷以长堤,与诸骑相失,惟行恭独从。寻有劲骑数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马。行恭乃

回骑射之，发无不中，余贼不敢复前，然后下马拔箭，以其所乘马进太宗。行恭于御马前步执长刀，巨跃大呼，斩数人，突阵而出，得入大军。贞观中，有诏刻石为人马以象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阙前。”

《新唐书·丘行恭传》所载与《旧唐书·丘行恭传》所载略同。

北宋游师雄《昭陵六骏碑》引《唐陵园记》(已佚)之意，云：“太宗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御制刻石文并六骏像赞，皆立于陵后，敕欧阳询书。”

持高宗时刊刻说的史料，现只发现《唐会要·亲谒陵》一种，记于贞观二十三年高宗即帝位未改元之时诏令雕刻十四国酋长石刻像之后，其文云：“上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酋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突厥颉利可汗……帝那伏帝国王阿罗那顺等十四人，列于陵司马北门内九峻山之阴，以旌武功。乃又刻石为常所乘破敌马六匹于阙下也。”

由于《唐会要》为宋人所撰，而《太宗实录》为唐人所撰，《旧唐书》为五代史官根据唐诸帝《实录》及《国史》所撰，所以自宋以后，关于昭陵六骏刊刻的时间，普遍采用太宗时刊刻一说。至于高宗时刊刻一说，人们普遍认为此时雕刻十四国酋长石刻像是准确无误的，这一点，《资治通鉴》可为互证，该书在贞观二十三年八月条载：“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庙号太宗。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上(高宗)遣人谕以先旨不许。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服者颉利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

关于昭陵六骏原稿的设计者，迄今为止，尚没有权威的史料予以记载，不过，从五代至宋，皆相传为阎立本。

北宋游师雄《昭陵六骏碑》云：“师雄旧见唐太宗六马画像，世传以为阎立本之笔。”这个画像，是纸本？还是绢本？不得而知，不过，从那时起，各种学术文章都将昭陵六骏原稿归于阎立本名下，为了慎重起见，往往冠以“世传”二字。

二、昭陵六骏的名字、排列次序及其原型战马参战情况

昭陵六骏的名字、排列次序及其原型战马参战情况，单

从现存的昭陵六骏文物来看，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现在，人们之所以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实在是多亏了宋代的好古之士游师雄。宋元祐四年(1089年)，游师雄在陕西为官，因昭陵六骏立于昭陵北阙，往来观瞻不便，乃令醴泉县令吕由圣于县城唐太宗庙立一石碑，把昭陵六骏按比例缩成线描画，刻于石碑上，又将每匹马的名字、毛色、所处的位置、太宗所题赞语以及立功简况照录刻于线刻画旁。游氏还亲自撰写了一篇短文，对其此举进行说明，该碑即所谓的《昭陵六骏碑》，现存昭陵博物馆。游氏刊刻《昭陵六骏碑》时，昭陵六骏上欧阳询所书的马名及赞语已经泐灭，但唐高宗诏令殷仲容所书马名及赞语还在，宋元以后，连殷仲容所书马名及赞语都因风雨剥蚀而不复存在。后来，《全唐文》等书及明、清、民国之际有关昭陵六骏的各种记载，无不以《昭陵六骏碑》为蓝本(《金石录》亦有载，但不直观)，要不是该碑保存完好，恐怕有关昭陵六骏的许多问题将会成为悬案。

《昭陵六骏碑》中，游氏所题，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还可以附带说明一些其他问题，现录于次：

师雄旧见唐太宗六马画像，世传以为阎立本之笔，十八学士为之赞。晚始得《唐陵园记》，云太宗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御制刻石文并六马像赞，皆立于陵后，敕欧阳询书。高宗总章二年，诏殷仲容别题马赞于石座，即知赞文乃太宗自制，非天策学士所为明矣。欧阳询书今不复见，惟仲容之字仍存，如写白蹄乌马赞云：“平薛仁果时乘”，由此盖知，唐史误以果为杲耳。距陵北五里，自山下往返四十里，岩径峭险，欲登者难之，因谕邑官仿其石像带箭之状并丘行恭，真塑于邑门外太宗庙庭，高庑丰约，洪纤尺寸，毫毛不差，以便往来观览者。又别绘图，刻石于庑下，以广其传焉。(元祐四年端午日，武功游师雄景叔题，京兆府醴泉县尉刁玠书，主簿蔡安时篆额，知县吕由圣立石。)

昭陵六骏系采用高肉浮雕法刻于青石之上的，在每匹马头上方又留一隅，与周边相平，疑即当年欧阳询书丹马名及赞语的地方。游师雄除了刊刻线刻昭陵六骏图外，还用泥塑方式，仿制了昭陵六骏，但这一组作品，未能流传下来。